

〈初山衣洲日記〉初探： 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

許時嘉**

摘 要

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曾於 1898 年 11 月至 1904 年 4 月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在此期間留下前後約 5 年半的私人日記。本文嘗試根據該日記史料，初步分析、建構日本人在臺北城的生活圖像，以凸顯日治初期日臺往來型態的多樣性。

過去對殖民地統治者由上而下絕對統治力的強調，可能在無形中過度強化或無限擴大解釋個人從屬於社群或集團的必然性，而忽略集團內部的階級、職業差異對統治現實所造成的影響，又或是個人可遊走在數種集團之間的多向性問題。從本文對初山衣洲詩文交流、金錢流動狀態的分析，可知日人與臺人的交流未必受限於民族差異，有時會因利益需要或重疊的社群交往，衍生出新的合作關係。初山衣洲對臺灣日日新報社內部人事更迭的紀錄，反映該報被收編為御用報紙過程出現的脫序狀況。此外，透過日記對古亭庄地區日人生活情狀的描述，可以嗅到日人社群內部不尋常的眾聲喧嘩與隱而不見的階級性。

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統治者集團與被統治者集團之間的隔閡不是鐵板一塊，殖民體制下權力階層的結構也未必恆久不變，有時會因彼此利益所需而出現必要的犧牲、交換或重構，以便達到更大的目的或需求。這樣的過程，使權力者及權力集團結構出現短暫或斷續的縫隙與漏洞。

關鍵詞：初山衣洲、在臺日本人、詩文交流、殖民體制、權力結構

* 〈初山衣洲日記〉乃筆者 2010 年 12 月走訪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得，手稿原為九部不同時點記載的日記，為行文方便以下統稱〈初山衣洲日記〉。本文引用之日記原文，由前愛知縣半田市立博物館學藝員朴澤好美協助辨識翻刻，經筆者校對、翻譯而成。日記資料整理期間，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張隆志、陳培豐等教授，及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王麗蕉、助理林佑芯、南山大學松田京子教授、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等人予以支持與協助，特此致謝。本文引用日記如需補充相關背景，以括號[]標之。原稿文字難以辨識之處，以□標之，以下不再贅述。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文責筆者自負。

** 日本國立山形大學人文學部專任講師

來稿日期：2013 年 1 月 2 日；通過刊登：2013 年 9 月 22 日。

- 一、前言
- 二、初山衣洲與他的日記手稿
- 三、日記呈現的日常生活
- 四、日記裡的人物往來：1900年代初期日臺人交流圖譜
- 五、日記中的事件：殖民地統治之內部重層性
- 六、結論

一、前言

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曾於 1898 年 11 月至 1904 年 4 月在臺灣就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期間，留下前後約五年半的私人日記。日記原稿連同其他書信、詩文手稿、個人出版物之孤本共 134 筆資料，現藏於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名為「初山衣洲遺書」。目錄公開於日本國內圖書館公共檢索網頁，為近年公開的收藏。近兩年臺灣研究者已注意到這批數量龐大的手稿，多針對用漢文楷書撰寫而成、未曾付梓的詩文手稿與作品進行相關研究，已見初步成果。¹ 但另一批以日文草書

¹ 以「初山衣洲遺書」為研究對象者，依序包括：廖振富，〈日人在臺漢文學之個案研究：初山衣洲在臺作品及相關資料蒐編與研究〉（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100-2410-H-005-041-MY2，2011/8/1-2013/7/31）整理初山衣洲在臺期間已刊及未刊詩文資料；許時嘉，〈從殖民到東亞：以初山衣洲之思想活動為中心〉，發表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主辦，「2011 青年學者論壇學術研討會」，2011 年 5 月 19-20 日，討論「初山衣洲遺稿」當中初山於保定時期已刊與未刊詩文，並與西村天因進行對照；白佳琳，〈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臺灣風俗詩》研究〉，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2012 年 6 月 9-10 日，討論未刊的《臺灣風俗詩》之創作意識；黃美娥、蕭惠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收於許素蘭主編，《鈞沉·瑣憶·補遺：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頁 1-38，整理介紹「初山衣洲遺書」典藏目錄與內容，並分析初山主編的《穆如吟社集》與未刊的《臺灣風俗詩》。該文簡要介紹初山各期日記概要，時間與地點雖稍有誤植（例如：明治年份與西曆年份對照有誤；〈落木葦日記〉記述地點應為日本關東地區，而非中國天津；〈常總日記〉紀錄時序雖為明治 30 年（1897）至明治 32 年（1899）間，但 1897 年 3 月開始後不久即停止，並被註銷劃掉，之後改記錄 1898 年 11 月 19 日來臺北定居後的日常生活），仍有助研究者理解「初山衣洲遺書」這份典藏史料的價值。

寫成的日記手稿，受限於語言與書寫字體，臺、日學界尚未有進一步的研究動向。

目前臺灣史研究學界討論日治初期社會背景及文人交遊時，多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協會會報》、《臺灣教育會》等公開出版刊物，或官方文書、個人文集、回憶錄為主要參考資料。其中私人日記方面有日人渡臺時寫下的海上日記，雖記述時點偏 1895、1896 年前後，時間略短，但已保留日治初期日人初來乍到的部分珍貴紀錄。² 當然，報紙也有公開刊登的遊記式日記，可惜因係為公開而寫，下筆時不免有所保留或修飾。此種自我檢閱的意識，或多或少削弱了反映現實情境的力度。³

相對於此，1895 至 1905 年間純屬私人、且長時間描寫臺灣民間日常生活者，除日前出版的《馬偕日記》（1871-1901）、尚未出版的〈傅錫祺日記〉（1902-1946，缺昭和年間 10 年份）⁴ 外，這部新發現、記錄時間從 1898 年 11 月至 1904 年 4 月的〈初山衣洲日記〉是另一代表。該日記主要為時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初山衣洲的日常生活記事，類似行事錄，多記載當日拜訪人物、個人行程、購買藏書，有時雜以個人心情抒發。內容雖簡潔，但透過人物交往脈絡，可略窺日治初期臺、日人間私下往來的狀況。上述三部日記背後，又意味著日治初期三種全然迥異的社群團體之活動空間分布。不同於傳教活動集中在淡水或郊外的馬偕或臺中樂社詩人傅錫祺，初山在臺期間先後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社和總督府學務課，活動範圍以臺北城為中心，與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有近距離的直接接觸，且私下往來的日、臺官紳甚多。因此，除反映當時臺北城周邊日本內地人的生活習慣，〈初山衣洲日記〉還記錄了一些未反映在新聞媒體的日常事件，有助於重構 1900 年代前後臺、日官紳的交往系譜與社會圖像，一窺殖民初期他個人的交游脈絡。就史料價值而言，無論在時間跨度或空間向度，〈初山衣洲日記〉都提供臺灣史研究一個全新的研究對象。

² 戶水汪著、戶水昇編，《萬頃文集》（臺北：九如山房，1928）；細川瀨，〈明治二十八年渡臺日記〉，收於細川瀨述，《小麟回憶錄》（臺南：加土印刷所，1927）等。後者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松教授熱心惠賜。

³ 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的日、臺人遊記日記可作代表。

⁴ 〈傅錫祺日記〉由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廖振富教授發現並整理，相關研究成果參見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以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 4（2011 年 12 月），頁 201-239。

目前學界討論日治初期日人在臺的角色問題，以總督府官員的官方文書與報導為出發點的相關研究較完整。特別是後藤新平及總督府官員的政策方針研究等，有助於理解總督府的統治手段與大時代政治氛圍。然而，殖民地並非單純只有「統治者 VS 被統治者」的對立。現有研究成果對初期日人社團及新聞言論的研究已提醒我們：日治初期日人社群中其實存在相當複雜的異質性與混雜性，也不乏相互攻訐、彼此矛盾的情況，⁵ 故單從「統治者／被統治者」、「母國出身者／殖民地出身者」、「協力／對抗」、「帝國主義／反殖民」的二元對立出發，未必能尋得解釋。另外，近年研究已指出，透過詩社活動、紳章授與或相關專賣利益交換，日治初期臺、日官紳的往來並非完全單線式的絕對統治或被統治，而是包含各取所需的政治權力統合或商業利益交換的權力流動模式。⁶

作為日治初期活躍於總督府與臺人士紳間的日人記者，初山衣洲這部純私人性的紀錄，其私密性有助於我們跳脫官方論述的框架，進一步思考上述問題的可能性。以下針對〈初山衣洲日記〉（1898-1904年）進行初步的介紹與探討。

二、初山衣洲與他的日記手稿

（一）初山衣洲其人

初山衣洲（1858-1919），名逸、逸也，衣洲為其字。出生於日本三河西尾（今愛知縣），幼時好學，拜藩儒筒井秋水為師，並曾入名詩人森春濤「桑三吟社」學習；18歲上京（東京），在鱸松塘門下學習漢籍與詩文，並曾從明治初期英語教育家、翻譯家尺振八習英語，學法律、經濟。在東京期間，初山對成島柳北的詩文為之傾倒，努力作詩，詩作頗受成島賞識。詩作曾連載於當時漢詩文雜誌最高權

⁵ 例如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年-1906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對內地人組合分合之研究；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殖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人間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對1900年代初期《臺灣日日新報》、《臺報》、《臺灣民報》間營利競爭關係之研究。

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頁105-181等。

威《花月新誌》，成為文壇新星。1880年，淺見平藏所編《東京十才子詩》將初山與橋本蓉塘、森槐南、大沼湖雲、永井三橋、杉山三郊、上夢香、岩溪裳川、鱸采蘭、大沼芳樹等並列新銳詩人。初山在詩壇闖出名號後，先後出版《鬢絲懺話》、《明治詩話》等漢文詩話集，但後來恃才耗盡家產，為求糊口，開始輾轉於東京各大報《朝野新聞》、《國會》、《東京日日新聞》負責漢詩欄選評的工作。1895年《國會》廢刊後，曾短暫在《東京朝日新聞》擔任記者，並在大江敬香主持的雜誌《花香月影》幫忙編輯，或大江主持的修藝社擔任通信點評的工作。但鎮日為生活奔波仍無法糊口，後來在臺灣日日新報社長守屋善兵衛的邀請下決定來臺。

初山於1898年11月來臺，接替同年6月在臺猝死的阪部春燈，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後轉至總督府學務課，直至1904年4月離臺為止。在臺初期，受總督兒玉源太郎禮遇搬進別莊南菜園(舊址現為南昌公園)，與臺人傳統文人、總督府官員頻繁作詩唱和，並不時隨兒玉出席揚文會、饗老典等重要官方攬絡臺灣士紳的文教活動，初山豐富的漢詩文背景，成為兒玉總督與臺灣士紳酬唱時的最佳利器；在臺期間留下豐富的詩文作品，多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為當時臺灣漢詩壇重要代表人物。⁷ 然而，1900年12月23日，兒玉被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召回東京，接替桂太郎擔任陸軍大臣，來臺次數漸少。到了1902年，初山亦為家庭問題與痢疾所苦，自夏天起不斷掛病號，年末曾一度回日本療養，不再活躍於臺灣日日新報社。同一時期，該社內部人事出現變動，擔任社長幕僚的田原禎次郎積極推動報社人事改組。1903年3月，田原重新任命淺水又次郎為編輯長，並禮聘原擔任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史講師的鈴木虎雄進入報社；初山則於同年4月離開報社，7月轉入總督府學務課，後於1904年4月告病辭職返日。回國後，他在東京為籌設提供清國留學生來日學習的東斌學堂四處奔走。⁸ 1905年下半年前往中國，⁹ 1906年4月前往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擔任日本教習；推估至1910年9月前後，仍在中國保定，¹⁰ 1910-1911年間回到日本。¹¹

⁷ 關於初山在臺期間漢詩文作品的分析，請參見薛建蓉，〈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研究：以臺灣報章雜誌漢文小說為考察對象〉(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蕭惠文，〈論初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10: 4 (2010年10月)，頁67-84等研究。

⁸ 初山衣洲，〈落木葺日記〉(未刊稿，1905)(大阪：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

⁹ 日記顯示1905年9月初山仍在日本，但1906年1月1日已在中國，推斷應於1905年10-12月離日。

¹⁰ (在保定)初山衣洲，〈聞故國洪水有作〉，《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9月28日，第1版。

¹¹ 初山於1910至1911年間的經歷仍待考，目前僅能確定1912年之際他人已回到日本，詳見〈苟然屋日記〉。

(二) 日記手稿特徵

根據現有手稿判斷，初山衣洲自青年時期開始即保有寫日記的習慣。目前中之島圖書館可見的日記手稿大致為 1891 年 1 月 17 日至 1907 年 12 月底、1912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17 日、1918 年 4 月，中間略有斷續。這些日記手稿，除〈游豐日記〉為鉛筆草書外，其餘全為毛筆草書，書寫在自行集結成冊的空白書信用紙、或隨身攜帶的小型筆記本，依年份別各自成冊，並依移居地的更迭而有不同的命名，詳見表一。

表一 〈初山衣洲日記〉手稿簡介

	日記別名(未刊)	紀錄時間	用筆、字體	備註
1	〈櫻雨草堂日記〉	1891年1月17日 -1898年11月17日	毛筆、草書	時居日本東京。
2	〈常總日記〉	1897年3月18日、 1898年11月19日 -1899年6月23日	毛筆、草書	1897年3月18日時居日本東京。1898年11月19日後時居臺北。另，1899年4月5日至4月17日隨兒玉赴彰化，寫成〈隨轅記程〉，刊於《臺灣日日新報》。4月18日至4月26日因忙於社務無紀錄。
3	〈懷耿堂日記〉	1899年8月15日 -1899年12月29日	毛筆、草書	時居臺北。10月21日至11月17日隨兒玉至臺南，寫成〈航南日記〉，刊於《臺灣日日新報》。另11月18日至11月27日因故未記錄。
4	〈澄心廬日記〉	①1900年1月1日 -1904年4月10日 ②1904年4月23日 -1904年12月30日	毛筆、草書	①1900年1月1日至1904年4月10日，時居臺北。1902年11月17日至1903年1月14日見〈游豐日記〉。另缺1903年5月17日-7月6日，時值初山短暫歸日。 ②1904年4月23日至1904年12月30日，時居日本關東地區。
5	〈游豐日記〉	1902年11月17日 -1903年1月14日	鉛筆、草書	游日本九州之豐後別府。
6	〈落木菴日記〉	1905年1月1日 -1905年9月20日	毛筆、草書	時居日本關東地區(小田原、東京)。
7	〈北游日記〉	1906年1月1日 -1906年11月25日	毛筆、草書	時居中國天津、保定。
8	〈冰壺軒日記〉	1907年1月1日 -1907年12月17日	毛筆、草書	時居中國保定。
9	〈苟然屋日記〉	1912年8月1日 -1912年12月17日	毛筆、草書	時居日本關西。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整理。

日記記述簡潔，內容以日常作息為主。每天的生活往往用一、兩行文字帶過，簡單記錄當日有誰來訪或個人行程，多臚列地名、人名、事件，少交代前後經緯與感想細節，有時僅記錄當日天氣即停筆。用字多省略連接詞，判斷事情經緯的主從關係時，需根據前後文加以琢磨。

初山衣洲來臺前、後的日記，記述方式無太大差異。但在臺期間，欄外多出較為詳細的手寫陰曆註記，這個習慣沿用至他回東京、甚至去中國保定以後。這種陰曆紀錄在同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記述習慣並不常見。¹² 為何有此習慣，目前尚無答案，推測原因可能在於初山衣洲作為漢詩人，會時常注意節氣，作為吟詩創作的根據。再者，初山會易經占卜，新年開始或遭遇不順時，都有他自行卜算的紀錄。例如1900年3月16日、1901年1月2日、1903年4月17日日記可見占卜內容，其中還有日人登門問卜的情況。

1900年3月16日：手塚[久三郎]來納稅，並託為妻病卜卦。

1901年1月2日：……此日卜卦得地火明夷，☱水大既濟。箕子之明夷，利貞。今年宜謹慎。

1903年4月17日：……晨卜身命，得震為雷、地雷復……

（三）日記史料與詩文史料的「溫差」

過去學界對初山衣洲的認識多透過詩文進行研究。例如1940-1941年，島田謹二依據《臺灣日日新報》登載初山的文筆活動、詩文交流狀況，透過作品與報導重建初山從1898年風光來臺至1904年黯然離臺的始末。¹³ 這部對初山在臺生活的詳盡研究，至今仍為理解1900年代初山衣洲創作活動與周邊官紳交遊的重要作品。島田指出，報社主管田原辭退初山理由在於不屑他漢詩酬唱的傳統文藝作風，加上初山與兒玉互動不再，對報社而言利用價值大減。島田根據初山在臺晚期詩文，指出他在臺的最後一年處於無業狀態，相當落魄。

¹² 例如年長初山20餘歲的漢學家依田學海（1833-1909），留下長達45年的日記《學海日錄》（1856-1901），同時期日記亦未見陰曆記載。

¹³ 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5:4（1940年10月），頁237-299；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5:6（1940年12月），頁375-462；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下）〉，《臺大文學》6:2（1941年5月），頁108-148。

然而，島田謹二筆下的初山形象，與日記記錄呈現的有些許出入。這點從初山衣洲日記的金錢收入可略知端倪。初山來臺初期經濟狀況較佳，除每月的固定薪資 70 圓，¹⁴ 有時接受委託，擔任詩文點評、潤稿、詩文講解的工作，多少會收到數圓至十餘圓的謝禮。¹⁵ 另報社每年春、秋兩季各發一次獎金，1900 年 9 月 29 日、1901 年 4 月 1 日初山各領到 120 圓。1901 年 9 月底未收到獎金，可能因發生鄭拱辰事件（詳見後文）、惹惱後藤新平而遭懲罰取消。但事過境遷後，隔年（1902）4 月 8 日，初山再度領到獎金 110 圓，顯示他在報社地位並未動搖，甚至還有加薪。¹⁶

但不久，初山罹患赤痢，1902 年 8 月至隔年反覆進出病院休養，1902 年 11 月 17 日回日本本國九州豐後別府養病，至 1903 年 1 月 14 日歸臺後仍為病痛所苦，反覆出入臺北病院。此時無法兼顧報社工作，引起社長私下反感。1902 年 9 月後無領到報社獎金的記載，再次出現獎金記載已是 1903 年 4 月 1 日，且大幅驟減至 30 圓。1903 年 2 月至 3 月間，初山打算在臺置產，積極欲購買南菜園土地。¹⁷ 動念買地可能與 1901 年 5 月臺北廳公布南門外市區改正計畫有關，¹⁸ 顯示他似乎有久居或長期投資之意。但 4 月 12 日守屋善兵衛召見初山，以他去年以來久病未癒、臺灣到底不適合客居、何不搬回內地療養為理由，暗示其自行辭

¹⁴ 〈初山逸也宛書狀集〉（未刊稿），收有初山衣洲各時期的聘書。另，初山不定期會收到勉勵慰勞獎金，例如 1899 年 12 月 25 日收到 70 圓，可能是慰勞他同年陪兒玉源太郎南下巡視。

¹⁵ 1901 年 6-7 月間於法院召開詩社、辦詩會，收到諸會員謝禮 12 圓。初山衣洲在臺期間幫人潤稿或代筆時，日記中甚少記錄到酬金，不確定是未收或有收但未記下。不過 1901 年 3 月 5 日提及他寄詩文到日本給依田學海翁修改時，附上酬金 2 圓，可推知潤稿應有基本價位。另，初山離臺歸日後，1904 年 7 月 26 日曾記錄收取潤筆費 8 圓。

¹⁶ 〈初山逸也宛書狀集〉記錄了初山各時期薪資，1900 年 4 月 1 日月薪 70 圓，1902 年 4 月 1 日調為 75 圓，同年 6 月調為 90 圓。

¹⁷ 初山衣洲打算買下南菜園的土地所有權，2 月 4 日、3 月 3 日與兒玉源太郎、2 月 22 日透過蘆原巡查向後藤新平交涉，獲准後 3 月 9 日土地局調查員前來丈量，3 月 16 日上繳 715 圓土地費與證書費用銀券 4 枚，3 月 17 日臺北廳即送來南菜園土地契約許可。從日記記載經緯看來，他應該已成功置產，因為 3 月 19 日還出現「送禮給蘆原」的記載，應是感謝其居中協調。根據尾崎秀真 1941 年回憶，兒玉 1899 年向楊姓地主買下南菜園用地花費 600 圓，從增值率看來，初山購買的土地應為兒玉所有無誤。但費解的是，尾崎回憶南菜園所有權一直都是兒玉源太郎一家所有，後來才寄贈臺灣婦人慈善會。1903 年 3 月初山買下南菜園土地所有權後，是否曾因故生變，從日記與史料上不得而知。參見尾崎秀真，〈新たに史蹟に指定せられたる南菜園の思出〉，《科學の臺灣》9: 4（1941 年 10 月），頁 217-221。

¹⁸ 相關公文未見於臺灣總督府公文書檔案，但《臺灣日日新報》刊有市區改正計畫的報導，參見〈南門外新市街的構造〉，《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5 月 29 日，第 2 版。

職。當天初山在日記裡寫到：「此舉應出自[後藤]長官之意，欲使大橋豹軒代吾之位。」隔天他馬上透過木下大東遞出辭呈，離開臺灣日日新報社。

三個月後，初山衣洲透過關係轉入總督府總務局學務課工作。¹⁹ 該工作薪水低廉，僅過去記者職的一半，讓他在日記中憤憤不平。1903年7月16日記載：「上午赴學務課佐藤課長處見面領聘書，回家打開聘書見月俸僅45圓，難忍不平，決心八月提辭呈。」但他仍持續工作到1904年4月離開臺灣前夕。離職前領到2個月離職慰勞金，讓他頗滿足。1904年3月29日寫到：「下午橫澤君從總督府打電話來找，旋即驅車前往，提及學務課方面將四月份薪資轉為兩個月分之賞金，其他□□運動不應中止等，聽了大為滿足」。

島田的研究與初山衣洲真實經歷出現出入，亦即兩者間存在的某種「溫差」，絕大部分來自初山筆下詩文史料與日記史料「質」的差異。相對於日記如實記錄一個人生活的作息，詩文則是情感的抒發，它將無形的感覺轉換為有形文字，反射內心世界的悲歡喜樂。詩文宛如血肉，可補足初山日記僅記載行程的冰冷文字軌跡。但同時，詩文也可能受限於文類本身強調花鳥風月的風雅性，過度放大某些心情，有時包含「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創作衝動。同樣，日記有記錄上的可信度，但以初山日記的簡潔程度，單從日記推估其言行仍有不足，如何權衡兩方史料、斟酌使用，考驗研究者的判斷。

三、日記呈現的日常生活

（一）活動空間：臺北城一隅

根據日記內容，初山來臺後受總督兒玉信任，住其別莊南菜園，幫忙看管別莊事務。兒玉餘暇時回別莊，有時會帶親信或軍、政、商界貴賓來訪，1900-1902年間常可見初山陪兒玉等人作詩、下棋，或至新店溪畔賞月；白天前往城中的臺灣日日新報社上班，平常也會參加舉辦於總督府官邸、法院、淡水館或酒樓的詩社活動，以及尾張人同鄉會或新報社（操瓢會）的例行應酬。沒有訪客的日子，

¹⁹ 〈初山逸也臺灣總督府雇ヲ命セラレ民政部總務局勤務ヲ命セラ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915冊34號，官規官職門進退類，1903年7月15日。

初山多在家吟詩自娛，或與日本本國、中國的友人通信。1903年辭去日日新報記者一職、轉任學務課後，日記顯示他參與「舊慣調查」與《臺灣府志》的翻譯工作，與小川尚義（時任總督府總務局圖書編修官）等有業務上往來，並出席學務課官話講習會等活動。1902-1904年間，他數度當選古亭村會衛生組合長，雖每每推辭，最後仍被舉任，²⁰ 當時衛生組合負責事務繁雜，日記不時記載會議上村民為事爭執不休的景況。

物質生活方面，初山訪客眾多，不時收到他人餽贈，包括菸草、酒、鮮魚、蕉實、肉脯、點心、罐頭，對象不僅限於日或臺人，有時還有一收到即轉贈的紀錄。²¹ 日記中無柴米油鹽或家用相關支出紀錄，但會記載購買高級日用品。²²

初山日常的活動範圍大致為南菜園、報社、總督府，有時到城中的盛進商店買日本進口高級日用品，或去平樂游、臺灣館、丸中溫泉、一力亭等餐廳酒樓。有時會去大稻埕參加臺人士紳的邀約，或至艋舺地區購買古漢籍；有時還會去北投松濤園休養。例如日記記載，初山為養病，1901年8月1日一大早前往北投松濤園，途中大雨急下，抵達時已成暴風雨，因道路水漲，連續兩、三天受困松濤園無法離開，直到8月4日友人乘轎而來，才得已僱轎冒雨而歸，途中經大稻埕黃玉階家小憩，晚上回到南菜園的住家。從這段記述可約略想像當時城內與北投之間的移動路線與交通狀況。

初山對臺人生活亦有關心。1901年9月1日日記寫到，晚上前往艋舺清水巖祖師廟看中元節普渡燈會。兩天後（9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出現〈清水張燈〉的報導，作者不明，文中寫道：「但見燈花燦爛、火樹輝煌，如入不夜城裏，加以樂音嘹唳，燭火交加，惹得紅男綠女快靚爭先，擁擠喧嘩，途為之塞，觀者咸謂比前年較盛，亦足見太平之景象也。（標點為筆者所加）」²³ 初山本人明確的觀後感想，則見於未出版的〈臺灣風俗詩〉，詩末寫臺灣歲時俗尚一節曾明

²⁰ 1903年3月24日：「下午中坊奈良造來，告知當選古亭庄衛生組合長，斷然辭退」；1903年5月4日：「本日臨時村會再度當選組合長，雖再三辭退，但眾望所歸不得已只好承諾」。

²¹ 1902年9月12日：「黑野探病送來大烏魚一尾，直接轉拿給橫澤」；1903年4月25日：「上午太田常次郎送來大鯛一尾，馬上派人送往山口宮司處」。

²² 例如1900年1月20日買外套16圓；1900年5月14日買懷錶22圓；1900年10月24日買毛毯9圓；1901年4月20日買金邊眼鏡22圓50錢、雨傘4圓60錢；1902年5月7日買懷錶鍊68圓25錢。以初山月薪70-90圓計算，皆是所費不貲的支出。

²³ 〈清水張燈〉，《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3日，第4版。

確提及中元普度時「大宮廟如鯤舩龍山寺清水巖……鼓樂喧闐火光如晝」，並另以「普度」為題寫下一詩：「千盞華燈似掛帆，山環海錯列甘鹹，不知幽鬼飢還飽，卻付游人任放饞」。²⁴

過去有關日治初期臺北城的研究，多傾向空間結構的討論，初山衣洲日記則提供該時期日人在臺北城內的移動實態，增添研究上的「人味」。根據學者對日治時期臺北人口空間分布的研究顯示，當時臺人與日人居住地區有較為分明的地域性質，臺人多定居於大稻埕、艋舺地區，日人則多居於城中。²⁵ 初山日記所呈現的日常活動，可確認當時日人主要的活動領域疆界。但同時，人在空間中呈現的移動性、流通性，反映日治初期人與人、或人與空間的關係，未必受限於定居地而彼此完全無涉。這種移動性，可能連結一種日常與非日常的生活空間感，跨越民族習慣差異形成的無形疆界，產生新的文化流通契機。

（二）閱讀習慣

初山來臺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其職業身分多少影響其閱讀習慣。黃美娥、蕭惠文曾針對「初山衣洲遺書」的讀書筆記與書鈔進行分析，指出其思想傾向儒、道兼修，閱讀的文學作品包含唐宋古文、明人文章、清人詩作、章回小說，承襲唐宋古文八大家以降的唐宋派文風，另對新學亦有涉獵，包括翻譯伊藤博文《日本憲法義解》、添田壽一《法治經濟大意》，或於任職保定軍官學堂教官期間翻譯軍事技術相關書籍。黃美娥、蕭惠文認為初山這種「漢學」、「新學」雙重教養，「一方面可以連結交好臺灣漢詩壇，一方面又可以傳達日本維新政府意志的重要知識資源」，²⁶ 強調他雙重教養作為疏通日、臺雙方意志的連接功能。

事實上，洋、漢兼修是明治前期日本國內教育的常態。幼年就讀藩校或地方漢學塾，進入正規教育系統後，始鑽研西方近代學問的新學者所在多有。另，東京大學古典講習課課程也是洋學、漢學並重。在明治時期雙重教養普遍存在的現象裡，初山衣洲這號人物又具有何種特殊性，則是筆者欲深究的問題。這點從其

²⁴ 〈臺灣風俗詩·第二稿〉（未刊稿），「初山衣洲遺書」。

²⁵ 西村睦男，《臺北市の地理學的研究》（東京：古今書院，1939）；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²⁶ 黃美娥、蕭惠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頁12。

來臺後知識體系的實際內涵可見端倪。從日記中可發現，初山在臺期間購買、接觸的書籍，全以中國古籍為主，完全沒有新學相關用書。有直接向書店訂購者，如1901年2月13日「赴艋舺書肆購買康熙字典、二十二史」；1901年4月23日「大阪嵩山堂送來《世說(新語)》、《莊子》、《博物誌》」；1901年7月14日「大阪嵩山堂送來《壯悔堂文集》」；1901年12月4日「大阪嵩山堂送來《明詩綜》、《毛詩鄭箋》」；1902年3月4日「向大阪嵩山堂訂購《遜志齋全集》、《徐孝穆全集》」等，以向日本本國購買的書籍為大宗。

另外，還有部分是與日、臺友人交換所得者，例如：1900年6月8日「橫澤[次郎]送來《山海經》與《唐代叢書》」；1901年3月30日「向市村藏雪買《宋學士全集》」；1901年6月18日「佐藤送來《歸震川全集》、《方望溪全集》、《吳梅村詩集箋注》」；1900年8月19日「新竹鄭鵬雲來，贈《廈門志》」；1900年10月18日「返還後藤[新平]長官差使《醉古堂劍掃》」；1902年2月12日「關口長之來，贈我《黃詩全集》」。

期間除偶爾自日本收到日國內出版的漢文詩文集外，閱讀的全為中國古籍，新學相關書籍闕如。初山晚年好友西村天因(時彥)為其寫傳曾提到：「季才以文章為命，而偃蹇不遇，中年以後奔走衣食，南入臺灣，西游支那，……東歸寡交寥寞，閉廬讀書，顧獨得花木以自娛，人或悲其不遇，而予則知其不遇之不足悲矣……季才好古是以不遇，唯其不遇故得發憤肆力於文章，窮年矻矻不息，今將老矣而寄情花木，翛然自得……而其所作文章益工庶乎，足以傳不朽，予且為季才喜之不暇，尚何悲之有。」²⁷ 西村提到初山專注於詩文更勝入世一展抱負，「好古是以不遇」而得以「肆力於文章」。若是對照日記中的閱讀書目，不難想像其鑽研古籍戮力甚深的形象。

初山的教育背景說明他新、舊學兼備的性格，有助於總督府與臺人的交流與連接。另一方面，他的閱讀習慣卻顯示對新學的認識，僅停留在年輕時研讀英文、法律、經濟時的涉略。「初山衣洲遺書」中雖留有軍事、法律相關書籍或文章，但多為初山在臺期間或於保定軍事學堂擔任教習時，因公需要所完成的評論與譯稿。早年的知識根基有助他將新學相關文章翻譯成漢文，卻未必意謂其等同與時並進、思想前衛的新興知識分子。相對於此，從蒐羅的藏書可知，他似乎更喜詩

²⁷ 西村時彥，《碩園先生文集》(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36)，卷3，頁22。

文抒情、文字推敲之樂。初山客居臺灣 5 年半期間，甚少於日記提到當下的心境，1901 年 3 月 31 日卻寫道：「昨日寄衣白遺序及與蓮舟先生書二文給大江敬香。²⁸下午小泉盜泉來談詩文，甚快。」1903 年 12 月 27 日：「夜赴舉行於丸中之詩會，頗快。」這兩則講述詩談之樂的難得紀錄，在甚少透露心境的日記文本中，更突顯他追求詩文之美的文人性格。²⁹

四、日記裡的人物往來：

1900 年代初期日臺人交流圖譜

〈初山衣洲日記〉記載的日、臺人物甚多，大多僅有姓氏或字號簡稱，有的僅是拜訪性質，有的則有深交。經筆者比對，目前暫時可確認完整姓名與身分者全部整理於表二（以下依身分、職業暫作區別，不分人物出現次數與交往深淺）。

初山日常往來的對象多為報社的日、臺人同事、總督府官員，偶有臺人士紳來拜訪，有的來詩談，有的是他人引薦、慕名而來、有事所求者（包括詩文修改、求職、求推薦信）。³⁰

（一）詩文交流的人際網絡

初山衣洲於 1899 年 9 月設立穆如吟社，營運方式是透過同好繳交會費或捐款。1899 年 9 月 27 日日記寫道：「早晨下大雨。送穆如吟社的廣告給新竹中津與基隆某及畑箕山。」兩天後即收到捐款，1899 年 9 月 29 日：「下午畑箕山送來穆

²⁸ 此二文後刊登於《花香月影》。

²⁹ 當他與西村天囚「文章之志」的對照時，此一「重文」的傾向份外明顯，參見許時嘉，〈從殖民到東亞：以初山衣洲之思想活動為中心〉。

³⁰ 1899 年 9 月 15 日：「畑箕山、藤井葦城來信與詩稿」；1899 年 10 月 3 日：「橫澤來話，修改督轅詩作後返還」；1900 年 2 月 13 日：「引旅病人投客所長川〔按：河〕喜田宗碩帶藤田軍醫之書來，請教碑銘文之修改」；1901 年 8 月 18 日：「夜湯目北水來詩談」；1901 年 8 月 29 日：「夜邀李少丞、邱心源、黃植亭、邱亦璠、李逸濤、市村〔矩義〕等開東坡會，雨來又忽晴」；1903 年 4 月 16 日：「夜寺本某持鈴木伊十介紹信來，表示想學詩」；1903 年 4 月 20 日：「游北投溫泉『鍬の湯』。四時歸。黃昏第八大隊兵卒藤本義□前來請求墨寶」；1904 年 3 月 3 日：「稻垣孫兵衛來，託我推薦其友人入臺灣神社。又南雲（前巡查）來，說他接下來要入驛傳社，託我當保證人，旋即寫好給他」；1904 年 3 月 4 日：「下午一點為南雲身分保證人之事前往驛傳社與山下秀實見面」等。

表二 初山衣洲在臺期間日記周邊人物統計表

日人	總督府	大島富士太郎、大須賀寅、柳原松塙、酒匂清治、三輪規、土屋光春、大中太一郎、大島久滿次、大庭永成、大橋弼、小松吉久、小澤德平、小川尚義、山本英太郎、山岡豐一、中山成太郎、中村是公、中村純九郎、中村覺、中澤潤二、中瀬秀次郎、木下周一、木村匡、木越安綱、毛受真一郎、片岡榮太郎、加藤尚志、加藤重任、白井新太郎、白水淡、石塚英藏、安江正直、安藤才次郎、朽木義春、竹島慶四郎、米田英之助、羽鳥重郎、西島助義、尾立維孝、村上義雄、谷信近、來原慶助、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松岡辨、近藤重功、金子直壽、長谷川謹介、青木喬、持地六三郎、畑弘、原口兼濟、浦太郎、草場謹三郎、高津慎、清水滸、鹿子木小五郎、朝比奈金三郎、湯目北水、愛久澤直哉、鈴木伊十、鈴木鉦之助、橫澤次郎、館森鴻、齋藤芳風、藤井乾助、藤田嗣章、關口長之、河喜田宗碩……等
	銀行界	土岐橫、川崎軍治、柳生一義、添田壽一……等
	商界	田村實（三井）、河村兔吉（三井）、中橋德五郎（大阪商船）……等
	民間、國語學校	淺井元次郎、喜多貞吉、市古春平、神田鴻城、江畑清次郎、中坊奈良造、增田正春、中村忠誠、戶倉廣雅、黃葉秋造……等
	記者同業	大橋豹軒、小泉盜泉、山田武吉、日下峰蓮、木下大東、市村矩義、吉田將茂、守屋善兵衛、尾崎秀真、村田誠治、梶內正六、淺水又次郎、大谷泉……等
	通信	土屋弘、大江敬香、田邊太一、西村天囚、杉山三郊、依田學海、林古松、信夫怨軒、喜多張輔、福井繁、尾崎久治、島津正長、淺見平藏、永井禾原……等
	來臺訪問	山吉盛義、井上勝、足利天應、阿部貞、鹽川一堂、三木福輔、鯉江高司……等
臺人	記者同業	呂玉峯、李秉鈞、李書、邱亦礪、翁林煌、張清澄、粘舜音、粘舜言、陳直卿、陳洛、陳履坤、黃植亭、謝雪漁……等
	民間人士、士紳	王松、李少丞、趙應奎、蔡國琳、鄭鵬雲、鄭如蘭、辜顯榮、王慶忠、江鏡清、蔡夢蘭、楊健初、邱心源、林瑞會、馬蘭成、周壬、李側仁……等
	來臺訪問	林輅存……等
中國	記者同業	章太炎……等
	來臺訪問、通信	王孝繩、孫葆璿、盧子銘……等
	其他	沈傳……等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整理。

如吟社獻金拾五圓。」出刊前1900年1月13日日記亦提到：「此日綠軒[毛受真一郎]贈穆社金五圓。」畑箕山為畑弘，時任臺南法院嘉義出張所書記；綠軒為毛受真一郎，時任職於嘉義郵便通信局。兩人皆為穆如吟社會員，詩作大多刊載於《穆如吟社集》。待2月26日詩集出刊後，初山將新刊分寄給諸位同好，名聲漸傳，加盟者漸增。

1900年3月3日：訪橫澤與長官官邸，贈穆社集……

1900年3月4日：分別給畑、佐藤、高木保吉、市古春平、齋藤芳風等人

寄信、寄詩集。……傍晚新竹中澤潤二來，加盟穆社

1900年4月1日：早晨嘉義朽木氏來加入穆如社，送金五圓五十錢

1900年4月28日：中澤潤二、三輪規二人捐錢給穆社^{中五}_{三三}。於玉山亭午餐。

新加盟者朽木為朽木義春，時任（1900年）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出張所檢查局檢察官；三輪規與朽木為同事，擔任書記監督，兩者皆與畑箕山共事於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出張所。中澤潤二，號松術，曾為玉山吟社成員，時任新竹郵便局長，與收到詩集的市古春平同來自新竹。從上述分析可知，日人會員間具有強烈的地緣性或同事關係。

另一方面，詩文亦串連起初山與臺人的交流。1900年3月15日的揚文會後，他與臺南士紳蔡國琳有進一步的往來，1900年6月29日寫道：「下午蔡國琳帶蔡夢蘭、陳履坤、楊健初等來」拜訪，兩天（7月1日）後即提到：「蔡國琳寄詩來」。同年8月20日，時任揚文會臺南支部總代的蔡國琳率支部幹事書記等前來臺北拜會總督府，初山善盡地主之誼，於8月21日：「招待蔡國琳往平樂園，與會者有館森[袖海]、安江[五溪]、加藤[雪窗]、中瀨[溫嶽]、黃植亭等」，隔天下午蔡國琳即回禮。

揚文會後，初山衣洲也與新竹士紳鄭鵬雲有詩文上的往來。1900年8月19日日記記載鄭鵬雲前來拜訪、贈《廈門志》，1900年10月26日則送來對聯。之後兩人持續交換詩文，如1904年1月16日寫道：「鄭鵬雲寄來《師友風義錄一卷》，內載予詩三首」。

另外，初山與新竹名詩人、《臺陽詩話》著者王友竹亦持續有書信往來。1900年9月14日提到寫信給王友竹，並歸還「三字經」。此處的「三字經」可能指同樣出身新竹、王石鵬所著《臺灣三字經》。據王石鵬自序，該書完成於「庚子端午後三日」，³¹ 同鄉文人王友竹作跋，並有小川尚義題字「如此江山」。就時序與著者關係來看，初山此時收到《臺灣三字經》的機率不小。日記中雖未記載前因後果，但王友竹未寄自己著作，而選擇寄友人王石鵬的作品給初山，值得玩味，顯示王友竹有引薦王石鵬給初山之意。另一方面，原本局限於兩人間的詩文交流，也因此出現質變與橫向擴張的傾向。初山在1902年1月29日日記寫道：「王友竹寄來紅樓夢絕句、農學須知等。」此處「農學須知」意指王石鵬翻譯橫山莊

³¹ 王石鵬，《臺灣三字經》（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次郎與刈宿幸治郎的〈農學須知〉。王石鵬為何翻譯這篇作品不得而知，可能是初山先行選定作品後需要翻譯，透過王友竹介紹而轉到王石鵬手上。在王友竹居中引線下，這篇作品後來成功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自1902年3月16日至1903年3月22日，時間長達1年。

從初山衣洲、王友竹、王石鵬的關係演變，可發現原本單純詩文創作的欣賞與交換，透過對象的轉變與接觸事務範圍的擴大，質變為另一種具附加價值的人際關係。臺人主動薦材的積極性，也顯示臺、日人的往來過程中，被殖民者所具備的能動性。

另外，1902年6月12日日記提到谷信近來信，要求幫忙斡旋臺灣日日新報社僱用趙應奎之事。初山於6月14日拜訪社長守屋善兵衛，討論僱用趙應奎之可能，此事後來成功與否未可知；兩周後的6月27日，初山夜訪時任臺北監獄典獄長的小松吉久，又提及此事。趙應奎的詩作後來刊於1902年12月出版的《江瀨軒唱和集》。如同這類引薦幫忙之事不勝枚舉。1903年3月22日「早上陳履坤帶彰化江鏡清前來拜託報紙之事，江帶威士忌、罐頭等伴手禮前來」。

（二）金錢往來的連帶性

初山衣洲金錢關係複雜，日記中大量記載向他人借貸的紀錄，對象多為報社同事或日本友人，不分日、臺人，上司副主筆村田誠治與漢文部同僚黃茂清都是他的借款對象，金額少則5圓、8圓，多則數十圓。³² 初山與上司村田的借貸關係相當頻繁，推測可能是以預支薪水的方式出借。其中，不乏向村田借款後，再將部分款項轉借給他人或周轉的紀錄，³³ 或是歸還之後再借的狀況。³⁴

除了一般借貸，他還參加臺北城內地區內地人之間的「賴母子講」，即俗稱的標會。賴母子講於日本鎌倉時代（西元十二~十四世紀）即出現，原是農村間為鄰保互助、儲蓄與融資合一的金融組織，是日本流行的庶民經濟活動。日本人來臺

³² 1900年6月2日：「向村田借金10圓」；1900年8月7日：「向杉田借金8圓」；1900年11月23日：「託鈴木向村田借金5圓」；1902年7月5日：「向黃茂清借金50圓」等。

³³ 1899年9月9日：「向村田借金40圓，其中25圓送給たま，6圓送給福井繁」；1899年9月30日：「向村田借用35圓，繳清諸費用，僅宮井之煙草費3圓50錢未付清」；1901年2月12日：「向村田借10圓，其中2圓借市村（矩義）」；1901年12月13日：「向村田借10圓，給國司3圓、並河2圓」；1902年4月5日：「向村田借25圓繳城內賴母子講」。

³⁴ 1903年4月5日：「昨夜還周溪銀三十枚，再借十枚」。

後，賴母子講會被帶進臺灣，普及於內地人之間，俗稱講會。剛開始總督府對講會並無特別管理。1901-1902年臺灣各地講會增加，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統計，1902年共有1,734個講會。³⁵ 隨著數量增多，惡意倒會的糾紛日益增加，總督府乃於1902年8月22日公布講會取締規則，進行監督。³⁶ 參加講會者多為一般小商家，因苦於無擔保品向銀行借款，改參加賴母子講作為資金調度之用，這種便利性與彈性也誘使部分官吏加入。1902年報導顯示，當時講會一口從2、3圓至200圓不等，總額從30圓至2、3千圓皆有，由此可知當時一般講會的規模。³⁷

初山衣洲最早有關賴母子講的紀錄出現在1902年4月5日，剛開始可能是為了儲蓄而加入。1902年6月30日寫道：「上半年種種開銷增加，不能儲蓄，僅參加賴母子講三筆共220圓餘，加上社內儲金50圓、預放於佐藤處17圓，共287圓，扣除借給黑野30圓，剩250圓餘的存款。」但1903年4月辭去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轉入學務課後，賴母子講成為他週轉資金的主要方式。1903年8月至10月間頻繁出現賴母子講的紀錄，顯示初山當時可能是講會的講主或當期講會的得標者，因當期講費徵收過程不順，出現不斷催繳，甚至要提出告訴的情況。經過居中協調後，又因對方無法繳款，只好接受打折。³⁸

講會無擔保品，其成立需倚賴講員間的信用與道義，因此成員多彼此熟識，或是透過其他共同團體而衍生的新金錢關係。例如：

1903年2月1日：夜江畑、川田來，約定加入橋本講

1903年3月8日：上午中坊、江畑前來，談加入增田賴母子講，斷然謝絕

文中除「川田」實際身分待查外，「江畑」為江畑清次郎，「中坊」為中坊奈良造，「增田」為增田正春，均為當時居住於臺北古亭庄附近的民間日人。三人

³⁵ 有關日治初期賴母子講在臺灣的演變與發展，參見陳宛妤，〈法律繼受與傳統融資活動：以合會與當舖在臺灣的法律發展軌跡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3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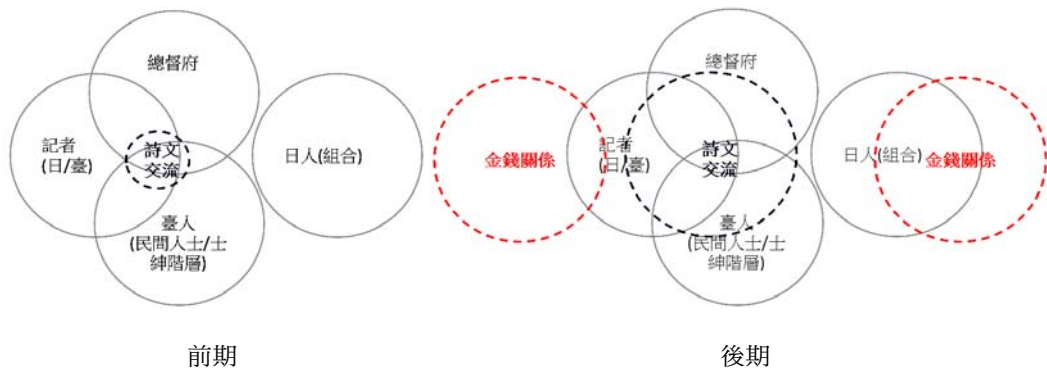
³⁶ 〈府令第六七號講會取締規則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713冊22號，警察監獄門雜類，1902年8月22日。

³⁷ 〈台北の賴母子講〉，《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22日，第5版。

³⁸ 1903年8月16日：「早上赴古岩井處討論中村講，約定二十日前收款，歸」；1903年8月31日：「早晨訪古岩井催繳講金」；1903年9月11日：「晚上託黑野催中村講」；1903年10月14日：「早上訪服部甲子造，託他向古岩井提告」；1903年10月25日：「上午古岩井來，商量賴母子講金能否減收」；1903年10月26日：「上午訪服部討論賴母子講。下午古岩井來，收百圓加四十四錢^{64錢}」；1903年10月27日：「訪服部甲子造，贈銀十枚作謝禮」。

皆參加古亭庄衛生組合，增田還曾任組合長。1902年8月古亭庄附近因大興土木建造陸軍經理部，使用輕便鐵道搬運泥沙，引起當地居民居住安全問題，日人庄民群起激憤，透過衛生組合頻繁開會、抗議，當時增田與江畑、中坊曾以組合代表陳情。³⁹但隔年（1903）5月，陸軍兵營工事因生鐵道搬運泥沙紛爭再起，增田以個人名義向監獄署提出出借鐵路要求未果，後假借組合長名義提出申請、借此私下承包泥沙搬運工程，事情遭披露後引發庄民不滿，經重選改由初山任新任組合長。⁴⁰他在日記中提到不願加入增田主持之賴母子講，是否與事件前後信賴關係破裂有關，不得而知，但其金錢往來對象具有相當的連帶性與重疊性。

透過以上分析，日記中的社群關係可歸納為以下發展模式（圖一）。從時間推衍來觀察日治初期各種社群間的重疊關係，可以發現：總督府官員、日、臺人記者群、臺人地方人士三大社群之間的連接點，初期源自於頻繁的詩文交換，但之後交流範圍開始向外擴散，這種擴散有可能是詩文交換對象的增加或深化，例如王友竹引薦王石鵬，帶動王石鵬與初山衣洲翻譯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擴大衍伸為無關詩文的請託與幫忙，例如求職引薦或人事疏通。且就協助內容上來看，詩文交流連結的人脈網絡未必有日、臺人的明顯對立，有時甚至是相互協助、無關意識型態的交流關係。此外，社群本身的連帶性又會衍伸出新的合作關係，例如記者群內的借貸關係，或日人組合成員參加標會的金錢連結，而這層金錢關係會因原生社群內部信賴的破滅而連帶受到影響。



圖一 〈初山衣洲日記〉顯示之日、臺交流網絡發展圖（1898-1904年）

³⁹ 〈古亭庄村民の紛擾〉，《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26日，第5版。

⁴⁰ 〈古亭庄人民の激昂〉，《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5月7日，第5版。

五、日記中的事件：殖民地統治之內部重層性

（一）總督府對新聞報刊的統御：以鄭拱辰事件為例

1899年1月至1900年，初山不時接受兒玉總督或後藤新平召見，前往總督府或官邸議事。這段期間正是總督府積極主持饗老典、籌辦揚文會的時期。

1899年1月18日：橫澤次郎委託編輯饗老典錄

1899年1月21日：上午與枚淑[章太炎]前往總督官邸謁見兒玉爵帥，爵帥態度極為殷勤⁴¹

1899年1月23日：受總督召見前往官邸，被委託種種有關臺灣學者會合之事

此處「臺灣學者會合之事」應指當年4月與總督下彰化巡視、以及11月饗老典，乃至隔年3月15日舉辦於淡水館之「揚文會」相關活動。其中，揚文會廣邀全臺士紳，對象皆為清國時期生員以上資格者。日後初山詩中談及兒玉兩次召見，寫下「巡邊旌旆蠻夷仰，饗老壺觴耄耄同，燕寢且延林下士，馳驅筆陣氣如虹」，⁴² 顯示兒玉延攬初山與臺人士紳溝通的意圖。

同時，1899年11月饗老典行前，兒玉總督積極透過初山密友、時任總督秘書官的橫澤次郎，再三約見初山入府，兩人相見十分頻繁。橫澤原為新聞記者，與初山有十多年交情，以湘南或陶城為號作漢詩。初山於同年10月6日、7日、8日、13日、15日、17日入官邸與兒玉見面，16日亦拜見後藤新平，推估應是討論南下舉辦饗老典的相關活動內容。饗老典之行相關文字紀錄後來以連載方式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名為〈航南日記〉，⁴³ 可以看出兒玉極端重視饗老典帶來的政治效應；再三約見初山，乃欲借重其文才能力，加強總督府對臺人的心戰喊話策略。

⁴¹ 當天兒玉贈章太炎（炳麟）帝國名勝圖，章太炎與初山分別有詩記錄此次會見。章炳麟，〈兒玉爵帥以帝國名勝圖見贈。賦呈一律〉、初山衣洲〈謁兒玉爵帥於公館。恭賦七律一章〉，同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29日，第1版。

⁴² 初山衣洲，〈謁兒玉爵帥於公館。恭賦七律一章〉。另，同樣接受召見，章太炎詩作中的氛圍卻全然不同，雖獲知遇之恩，但心情仍如怖鴿，擺盪尋無路。

⁴³ 〈航南日記〉計13回，《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22日-12月15日。

就此看來，總督府對《臺灣日日新報》應是全權掌控。然而，1901年9月18日《臺灣日日新報》出現一則新竹辨務署參事鄭拱辰私造鴉片人贓俱獲的報導，說明他目前正接受法官訊問審理。⁴⁴一週後，9月24日卻出現〈參事無罪〉的報導，指出記者於新竹訪友後得知，鄭拱辰私造鴉片一事屬誣告。鄭拱辰身為參事但深居簡出，不願利用職權為有心人士謀利，遭人怨恨，向辨務署第二課警察誣告他購買私煙。他遭誣告後旋即「逞身第二課直指其誣，即獲無罪而還」，「蓋鄭閱歷世事既深，豈不知買私為法律所懲而肯顯然犯之乎。然其所不免毀謗之來者，皆其素常未曾推恩解惠於人，有以召之耳。竹城訪友所云如此」。⁴⁵

但兩天後，立刻又出現一則更正報導〈參事犯法〉，指先前報導鄭拱辰被抹黑私造鴉片、獲判無罪乃謬傳，報導人不察云云，以正視聽。⁴⁶

短短一週內，鄭拱辰事件連三轉，從有罪到無罪、再到有罪，之後報紙陸續有幾則他被判刑的簡短報導，風波看似就此停止，但背後卻掀起人事風暴。根據初山日記的記載，這則錯誤報導，引來後藤新平震怒，造成臺灣日日新報社漢文部的人事地震，初山引咎辭職，報導記者呂玉峯、粘舜言、張清澄因此被解僱。

1901年9月24日：大島警保課長[大島久滿次]請人來找，立即前往。他命我取消新竹鄭拱辰無罪釋放事件報導

1901年9月25日：社長說鄭事件激怒長官[後藤新平]，我決心引咎辭職，下午向村田遞辭呈，之後去見大島、橫澤君等人

1901年9月26日：昨夜……又與長官見面，長官震怒斥責

1901年9月28日：昨天進行編輯部改組，當天解雇呂[玉峯]、粘(弟)[粘舜言]及張清澄等職位，因事出突然，市村[矩義]頗多抱怨

1901年9月29日：早上訪社長轉交給呂、張的信。又訪木下[大東]晤談改革之事

1901年10月1日：本日因編輯部改組，眾多紛紜

1901年10月5日：昨日市村來探詢我辭職一事

⁴⁴ 〈知法犯法〉，《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18日，第4版。

⁴⁵ 〈參事無罪〉，《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24日，第4版。

⁴⁶ 〈參事犯法〉，《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26日，第4版。

誤傳報導刊登後，24日初山立即被時任警保課長的大島久滿次找去，要求取消報導。25日被社長點名，26日雖當機立斷刊登更正啟事，但26日晚上仍被後藤新平找去，當場狠遭斥責。從後來日記內容判斷，初山雖遞辭呈但被留任，僅臺人記者被解僱；臺人張清澄被解雇後一個月即因病過世。⁴⁷

後藤新平震怒的原因，應與報導傷害統治權威有關。根據26日更正啟事，更正內容主要有四：其一，鄭拱辰控辦務署第二課誣告而獲無罪之說，荒謬不實，當天辦務署第二課警察官嚴查事證後立刻移往法院，法院明察秋毫、審問嚴密，加上鄭拱辰罪證明確，豈能躲過法眼。其二，當日已罰金3百圓。既有罰金，何來無罪說，更遑論第二課係屬誣告云云。其三，鄭拱辰身為參事，理當為人民表率，如今竟知法犯法，罪當加重數級。敬告全臺鴉片癮者當以他為鑑，切勿以身試法。其四，此次誤傳乃記者之失，且編輯未察照刊，此一失誤業界自有公斷，但有此誤傳不代表鄭拱辰即可卸責。⁴⁸

由更正啟事可知，記者再三強調辦務署第二課與法院明察秋毫，並主張鄭拱辰罪證明確，既不會誤判、亦不可能縱放，企圖藉此凸顯殖民政府紀律之嚴明。然而，此例也證明：總督府或可主導報刊言論，但中間仍不免出現脫序的現象發生。參事無罪到犯法的一連串更正，意謂一種權力重新整編的過程。

（二）日人社群內部的階層差異：以古亭庄衛生組合紛擾為例

初山居住的古亭庄位於臺北小南門郊外，日人戶數約四十餘戶，1902年5月成立衛生組合。⁴⁹ 初山多次當選古亭庄衛生組合長，日記裡不時會提到古亭庄內部的大小爭執。

1901年12月2日《臺報》出現一則嘲弄古亭庄為「禿村」的報導，指北門街經營日本進口蔬果批發生意「兀八百屋」的淺井元次郎、開野中洋服店的野中堪次郎、以及兒玉源太郎等，皆於此庄築有別莊，由於這些人經營的店家名稱帶有「禿」（「兀」日文為「はげ」）字，故《臺報》記者戲稱古亭庄為「禿村」。⁵⁰ 這

⁴⁷ 1901年11月6日：「昨日張清澄病死，贈一圓奠儀」。

⁴⁸ 〈參事犯法〉，《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26日，第4版。

⁴⁹ 〈古亭庄の衛生組合〉，《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16日，第5版。

⁵⁰ 〈禿村〉，《臺報》45（1901年12月2日），第1版。關於禿八百村的背景，詳見橫澤次郎，《兒玉藤園將軍逸事》（臺北：新高堂，1914），頁57-69。

則看起來像流言蜚語參雜八卦性質的小報報導，引來古亭庄村民極大的反彈，理由在於：禿村之名，形同讓古亭庄淪為「兀八百屋」店主一人壟斷之物。⁵¹ 憤慨的村民以初山為首，群情激憤地向「兀八百屋」商店抗議。⁵² 《臺報》記者隔天立即以「禿村一揆」（禿村農民暴動）為名，報導這次抗議事件，並嘲弄道：「禿村之名乃由兒玉總督閣下命名，老村長衣洲與當地老百姓想取消要找兒玉男爵才是。」⁵³ 筆戰原本仍要繼續下去，之後茶商公會顧問大庭永成前來調停，才告結束。⁵⁴

此事件背景仍有許多不明之處，例如《臺報》對古亭庄的嘲弄實含對兒玉源太郎的不滿，其中是否涉及何種政治性的反抗意味，目前筆者礙於研究進度尚未深入探究。但從主要由日人農夫組成的村民對禿村一詞的反感，以及記者對日人農民反應的嘲弄，可以發現日人社群內部帶有某種階級上的對立。

這群古亭庄的日人農夫十分強勢，經常透過組合伸張自我權益。古亭庄衛生組合成立三個月後，1902年8月因某位日人商人承包陸軍經理部建築工事，使用連接至臺北監獄的輕便鐵路搬運古亭庄河畔的泥沙，引來庄民們——特別是農民們的抗議。庄民們抗議的理由在於臺車日夜往來輕便鐵路，造成沿路庄民的生活不便，二來過度採掘川邊泥沙將破壞川邊閒適風光，沿岸住家地層也會變形，一旦大水來時，周邊農田旋即被淹沒，影響農民生計。⁵⁵ 庄民連日來一面向承包商要求變更挖掘泥沙的場所，一面向臺北監獄要求撤去輕便鐵路；初山1902年8月23日與24日的日記寫道庄民們為要求禁止挖掘泥沙與要求裁撤輕便鐵路而終日開會、吵鬧不休。最後由組合委員增田正春、江畑清次郎、中坊奈良造到臺北廳陳情，官方派遣技手勘驗後決定中止泥沙挖掘，但對鐵路拆遷一事不置可否。

《臺灣日日新報》登載事件始末，提到此次抗議運動「主要集會皆由庄內從事農業的庄民們發起，並非衛生組合本身的運動」。不過從初山日記的記載可發現，這些運動多透過組合的聚會進行討論，顯示衛生組合的功能不單僅止於防疫，其實也擔任某種自治組織或反映民意的綜合性角色。另一方面，日人農民對

⁵¹ 〈禿村一揆〉，《臺報》52（1902年1月7日），第1版。

⁵² 1902年1月3日：「上午訪淺井談禿村事」；1902年1月4日：「是夜因淺井禿村事件開村會，苦了淺井」；1902年1月6日：「夜淺井妻來談禿村事件」。

⁵³ 〈禿村一揆〉，《臺報》52（1902年1月7日），第1版。

⁵⁴ 1902年1月22日：「大庭永成為禿村事件來社拜訪」；1902年1月23日：「此夜禿村事件仲裁人大庭永成前來，與評議員組頭等協議後，終於取消臺報與臺北日報上的報導，告一段落，晚上一點全員歸去」。

⁵⁵ 〈古亭庄村民的紛擾〉，《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26日，第5版。

自身權益的關心與抗爭活動，以及地方政府對問題的選擇性回應，呈現民意與官方意見交流的某種可能與侷限。

初山衣洲對古亭庄民一連串抗爭的反應，凸顯日人內部的差異與複雜性。1902年8月落幕的輕便軌道搬運泥沙糾紛，於隔年5月再起，這次禍首是去年到臺北廳陳情的衛生組合長增田正春，因包下搬運工程而假稱全村庄民同意、欲租借輕便鐵道，實情遭披露後引來庄民不滿，改選初山為組合長。初山無法推辭只好接下，但對庄民們喧囂的態度頗不耐煩。如1903年5月5日日記寫道：「村民來喧囂，令人生厭」；1903年5月7日：「村民議論紛紛，整日吵鬧不休」；1903年5月8日：「村事爭議紛擾。」憤恨不平的日人庄民，以及日記裡對日人庄民態度漠然的初山，或許正是這種內部差異的最佳隱喻。

六、結論

本文根據新史料〈初山衣洲日記〉，建構日治初期日本人在臺北城的一個生活圖像，初步爬梳此一時期日、臺人往來型態的多樣性。

從詩文交流、金錢流動狀態可知，日、臺人間的交流未必受限於民族差異，有時會因利益需要或重疊的社群交往，衍生出新的合作關係。初山衣洲對臺灣日日新報社內部人事更迭的紀錄，也可用來思考該報被收編為御用報紙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脫序狀況。此外，透過日記對古亭庄地區內地人生活情狀的紀錄，可以嗅到日人社群內部不尋常的眾聲喧嘩與隱而不見的階級性。

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統治者集團與被統治者集團間的隔閡不是鐵板一塊，殖民體制下權力階層的結構本身也未必恆久不變，有時會因彼此利益所需而出現必要的犧牲、交換或重構，以便達到更大的目的或需求。這樣的過程，也讓權力者及權力集團結構出現短暫或斷續的縫隙與漏洞。

同時，過去對殖民地統治者由上而下絕對統治力的強調，也可能在無形中過度強化、或無限擴大解釋個人從屬於社群或集團的必然性，忽略集團內部的階級、職業差異對殖民地統治現實所造成的影響，又或是個人可遊走於數種集團之間的多向性問題。

這些謎團透過〈初山衣洲日記〉此一記錄私人活動脈絡的獲得一些初步的印證與解答，也期待這部新史料的出現，有助於日治初期研究的再發現。

引用書目

《臺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713冊22號、915冊34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初山衣洲遺書」。大阪：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

戶水汪（著）、戶水昇（編）

1928 《萬頃文集》。臺北：九如山房。

王石鵬

1996 《臺灣三字經》。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白佳琳

2012 〈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臺灣風俗詩》研究〉，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2012年6月9-10日。

西村時彥

1936 《碩園先生文集》，卷3。大阪：懷德堂記念会。

西村睦男

1939 《臺北市の地理學的研究》。東京：古今書院。

吳文星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尾崎秀真

1941 〈新たに史蹟に指定せられたる南菜園の思出〉，《科學の臺灣》9(4): 217-221。

李承機

2004 〈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人間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

1940 〈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5(4): 237-299。

1940 〈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5(6): 375-462。

1941 〈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下）〉，《臺大文學》6(2): 108-148。

細川瀨述

1927 〈明治二十八年渡臺日記〉，收於細川瀨述，《小鱗回憶錄》。臺南：加土印刷所。

許時嘉

2011 〈從殖民到東亞：以初山衣洲之思想活動為中心〉，發表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主辦，「2011青年學者論壇學術研討會」，2011年5月19-20日。

陳宛妤

2005 〈法律繼受與傳統融資活動：以合會與當舖在臺灣的法律發展軌跡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程怡雯

2011 〈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美娥、蕭惠文

2012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收於許素蘭主編，《鉤沉·瑣憶·補遺：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頁 1-3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楊永彬

1996 〈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 年-190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頁 105-181。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

葉肅科

1993 《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廖振富

2011 〈〈傅錫祺日記〉的發現以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4): 201-239。

2011-2013 〈日人在臺漢文學之個案研究：初山衣洲在臺作品及相關資料蒐編與研究〉。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100-2410-H-005-041-MY2。

橫澤次郎

1914 《兒玉藤園將軍逸事》。臺北：新高堂。

蕭惠文

2010 〈論初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10(4): 67-84。

薛建蓉

2012 〈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研究：以臺灣報章雜誌漢文小說為考察對象〉。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

鍾淑敏

1989 〈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 年-1906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Diary of Japanese Sinologist Momiyama Ishū

Shih-chia Hsu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iary of Japanese Sinologist Momiyama Ishū, a journalist of Taiwan Daily News (臺灣日日新報) from 1898 to 1904,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d reconstruct the daily life of a Japanese journalist living in the city of Taipei in the colonial era; in particular, his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Taiwan Sōtokufu) and Taiwanese gentry.

Examining Momiyama Ishū's writings and financial exchanges revealed that ethnic differences posed no hindrance to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Instead, collaborations and business partnerships were established under mutual interests or common social networks. The personnel changes noted down in Momiyama Ishū's diary also reflected the chaotic condition when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took control of Taiwan Daily News. In addition, the diary records of Japanese's daily life in Ko-tei Sō (古亭庄) area offered a glimpse of the particular heteroglossia and hidden hierarchy inside the Japanese circle.

The above analysis exposed the shif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r and the ruled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power structure under the colonial system. There were times when sacrifices, exchanges and power restructuring had to be made for the sake of mutual benefits or to achieve a greater goal or advantage. In the process of such, transient interruption to the sovereignty and vulnerability of those in power might arise.

Keywords: Momiyama Ishū, Japanese in Colonial Taiwan, Social Interaction, Colonial System, Power Structure